

# 哈佛大学校长是如何看待本科教育的

——博克《回归大学之道》介绍

陈 怡

**摘 要:** 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回归大学之道》一书的主要内容,并且分析了该书对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及其改革的启示。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对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改革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值得中国主管教育的领导、大学校长、广大教师和学生认真阅读。

**关键词:** 本科教育; 大学之道; 哈佛大学; 博克

提起哈佛,对中国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一定是如雷贯耳、心存敬意的:啊,那是顶尖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提起哈佛,提起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想到的一定是他们的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因为这正是今天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为关注的目标之所在。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哈佛大学的校长是如何看待本科教育的呢?提出这个问题,有人甚至会感到奇怪,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还会关心本科教育吗?人们的这种疑问在中国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是不会或者很少去关心本科教育的。但是,事实却是,他们不仅关心本科教育,而且对本科教育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博克的《回归大学之道》就是一个明证。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我看到了这本书,然后居然一口气将其读完了。不能不说,这样题材的一本书,在我这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年龄,它不啻为真正的一片巫山云。读完以后,马上产生了两个感觉:一是值得阅读,二是值得推荐。平心而论,这确实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值得中国主管高等教育的官员读,值得中国大学的校长、院长读,值得每一个大学教师读,也值得每一个大学生读。因此,我愿意在此郑重推荐这本书。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本书,先对作者和书的内容作一个较为详细的介绍,然后再谈引发的启示。

## 一、关于博克和他的《回归大学之道》一书

德雷克·博克,美国律师和教育家。1930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1951年本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54年硕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1958年博士毕业于华盛顿大学。之后即在哈佛大学从事法律教学和研究,1968—1971年任法学院院长,1971—1991年任校长。之后任教于哈

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教育学院。2006年在哈默斯校长卸任后又出任了一年的临时校长。出版了《走出象牙塔》(1984)、《美国高等教育》(1986)、《大学和美国的未来》(1990)、《市场中的大学》(2003)、《回归大学之道》(2005)、《幸福政治学》(2010)等著作,是美国颇负盛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

《回归大学之道》一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可见,它是一本专门研究大学本科教育的书。全书除《导言》外共分12章:第一章,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第二章,教师对本科教育的态度;第三章,大学教育的目标;第四章,学会表达;第五章,学会思考;第六章,培养品德;第七章,培养合格公民;第八章,生活在多元化的校园;第九章,为全球化社会做准备;第十章,培养广泛兴趣;第十一章,为职业生涯做准备;第十二章,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展望未来。(注:该书已由侯定凯等人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5月出版。)

在《导言》中,作者回顾了从198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的大公司面临海外资本的竞争,日本产品全面涌入美国商店,政府官员、记者和分析家开始寻找美国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于是公众批评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企业的行政主管,接下来是教育。在公立中小学饱受抨击之后,高等教育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一批官员、公共知识分子、记者和大学教授都纷纷加入抨击大学的行列。在对大学的诸多抨击中,本科教育质量下降是被反复提及的共同话题之一。批评的方面包括:课程体系缺乏统一目的、学术标准下滑、大学逐渐变为提供就业帮助的训练营、教师无暇关注学生等。在回顾这些情况后,作者指出:“遗憾的是,在过去20年的批判浪潮中,人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改革建

陈 怡,东南大学高教所教授,本刊主编。

议。事实上，这些批评也显得底气不足。”“他们很少认真地关注学生学了什么东西，很少深入大学课堂去了解学生到底学会了什么。”所以，作者“尝试着充分利用现有关于‘学生学习’与‘大学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影响本科教育质量的重大问题提出见解”。可以说，本书就是专门针对这一话题进行思考、研究和回应的结果。

在第一章《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中，作者首先对美国本科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简要的回顾，然后又从历史的角度再次谈到了对大学的批评：对本科教育缺乏清晰认识，没有阻止知识不断分化的趋势，牺牲博雅教育迎合职业主义，重科研而轻教学，本科教育的质量不复曾经的辉煌。作者指出，本科教育质量下降的说法缺乏历史依据，但是，要说教学质量提高了也是无法获知明确信息的，甚至不可能达成共识，因为本科教育的现状是难以量化、难以评价的。而为了评判大学的成败得失，思路之一是先去考察大学教授的行为，因为他们决定了大学的学习内容及方向。于是就有了本书的第二章。

在第二章《教师对本科教育的态度》中，作者指出，对大学教师的批评，如承担了过多的科研和校外咨询任务，以至于忽视教学和学生，过于简单化。问题在于，无论教师还是院长、校长，都确实没有感到必须不断寻求更新、更好的教育方法的压力，也没有体会到应该尽可能提高教育质量的紧迫性。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教师及学术领袖们拥有了相当的自由，得以随心所欲地塑造本科教育、选择讲授内容，于是至少暴露出六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大学存在不同认识，如对知识功能的不同认识、不同态度：文理教授赞同娴熟的写作、清晰的思维、流利的外语，而学者认为掌握复杂的知识体系、攻克难题更具挑战性，学生认为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物质成就。第二个问题是缺乏合作。教授及其院系长久以来各自为战，学校在讨论课程设置问题时，并不是为了制定有利于学生的课程规定，而是为了在“各自为战”的学者之间寻求平衡，从而教授和院系之间缺乏合作，导致的效果是“整体小于部分之和”，使学生失去一些宝贵的学习机会。第三个问题是忽视教育目的。由于对教育目的缺乏深入思考，教师们在探讨课程改革时就会忽视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对本科教育的重要目的视而不见；讨论教育目的时走过场以致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如评估时不可能恰当地评价课程内容，改革本科教育时很难作出合理的决策，无法有效地评估课程要求是否合理、教学方法是否恰当、评价学生的方式是否合理；虽然在理论上认同教育目标，但是否有足够的课时实现目标

却无人考虑；教师们一方面同意课程要求，另一方面却不愿意亲自讲授其中的必需课程。第四个问题是过于强调通识教育，却没有改善通识课程的质量。同时，很少认真考察专业课程，很少组织各院系教师从学校层面对专业教育作整体评估，也不关注自由选修课。第五个问题是重视增加课程而忽视教学方法，因为前者容易而后者困难。这导致一方面大学的课程数目在不断增长，但另一方面学生真正学到的知识却并未显著增加。同时，教师对教育研究领域的成果视而不见。第六个问题是是对课外活动重视不够。多数评估只关注教师参与的活动，然而当被问到大学期间真正有收获的关键事件时，学生更多提及的是课外的某次活动。因为课内和课外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所以如果不考虑课外活动，一些课程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在本章的最后，作者对常见的批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针对本科教育的广为流传的批评意见，大多偏离了真正重要的教育主题——怎样改进教学方法、怎样设置专业课程、怎样让道德发展与公民教育恢复应有的地位等，并提出有一种能更好地评价大学的方法：在评价前首先明确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这就切入到了本书的主题：回归大学之道。

在第三章《大学教育的目标》中，作者首先指出，要对本科教育问题展开有效讨论，必须厘清大学希望大学达到怎样的目标，即大学应该让学生通过四年学习收获什么。然后经过论述，得出自己的观点：制订单一的、“统领全局”的大学目标，或者把大学目标局限于智力发展领域，都无法涵盖本科生活的全貌，因此大学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多方面的。经过严格选择，作者确定了大学本科教育的八个目标：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公民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素养、全球化素养、广泛的兴趣、为就业做准备。接下来，作者以六章的篇幅针对这八个目标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在第四章《学会思考》中，作者首先指出，美国课程改革委员会一直强调：学生应当学会清晰、准确地表达，同时还应该注意表达的风格和优雅。而且针对美国大学生的调查表明，他们也最重视表达能力的培养。接下来，作者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会表达：一是写作，二是口头表达。在写作方面，作者指出，没有其他如何一门课程像“英语写作”这样，占用了本科生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在提高写作教学的质量方面，各大学的成就却乏善可陈。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大家都认为重要，但资深教授和有水平的教师却不愿意亲自上课，只好让兼职助教从事这项“费时又低薪”的工作，从而形成了教师频繁换

岗、缺乏教学动力、学生人数变化、资源普遍不足的状况。那么应该如何改进写作课呢？作者认为，合理的方式是在教学之初就尽量明确教学目标，应该组织所有教师参与讨论，整个大学都应对学生的写作能力负责，从而采取各种方式帮助学生提高写作能力。如只要有可能，课课都应有写作。同时，写作课应由专职教师负责，教师要向学生提供充分的反馈。学校要让教师获得适当的回报，也要及时评估教学工作的成效，推广效果最好的教学方法。在口头表达能力方面，它在学校的地位还很低。作者认为，口头表达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书面表达，甚至应该更重要，因为它还包括人际交流、团队交流和公众演讲等多方面内容。现状所以如此，可能因为学术界认为该领域缺乏独特的学术研究方法，也缺乏严密有效的训练方法。作者指出，这一情况让人失望，它歪曲了现代大学应有的重要职能，大学必须尽力改变这种状况。

在第五章《学会思考》中，作者首先指出，围绕大学课程问题有许多争议，但几乎所有教师都认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本科教育的重要目标，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却只是纸上谈兵，很少付诸实践。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之所以会如此爽快地认同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本科教育中的重要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们很少仔细思考自己应该为培养这种能力承担怎样的责任。接着，作者从“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数理推理”和“专业课”三个方面进行了如何培养学生学会思考的讨论。在“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面，作者认为，总的来说，尽管现有研究表明，学生的逻辑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在大学期间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一项调查发现，还有 2/3 的学生认为，他们的分析技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进步。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仍有大部分教师采用“填鸭式讲座”的教学方法，评价的方法也存在问题，设计的考试题型仅仅是选择题、简答题，或者直接将命题工作交由未经训练的研究生负责，这样学生便会采取“死记硬背”的方法应付考试。作者认为，这样的评分方式毫无教育意义，纯粹只是将学生排出座次。为此，作者推荐擅长于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教授所遵循的一些指导原则：上课前先思考自己希望学生学到什么，应该掌握哪些推理技能；需要了解哪些知识，以便能解决课堂中提出的问题；思考如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主动学习的愿望，以避免学生只为追求分数而缺乏内在兴趣；通过有趣的提问，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思考过程的缺陷；通过组织课堂讨论、小组合作项目及其他形式的“主动学习”活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习惯，鼓励学生对问题作严密地推理与分析；设计与课程目标紧密相关的平时

作业和测验；及时给予学生反馈，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以及还需要做什么；为学生设定高标准，并让学生相信自己可以实现这些目标。在“数理推理”方面，作者介绍了美国国家与学科委员会组织专家确定的学生在算术、数据、计算机、建模、统计学、概率、推理等方面需掌握的内容，并强调要将其运用于社会实践。同时，也需要尽可能将数理贯穿到所有相关的课程中。在这一小节，作者还专门推荐了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马祖尔的一种“问题讨论式”教学法：学生上课前要回答两个与阅读内容有关的问题，并指出自己认为难以理解的内容；在上课时，只讲 10~15 分钟，然后给学生出一道有关“基本物理原理”的选择题，让学生用电子选择器作答，并分组讨论答案，讨论后再次作答。而后，教师根据情况进行或详或简的讲解。在一次课中如此循环，可讨论若干重要原理，并还可由助教在每周的习题课中进行深入讨论。实践表明，效果远好于传统方法。在“专业课”方面，作者认为，设置专业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深入钻研某一复杂领域，但评估时往往不重视对专业课的评估，致使有的专业课要么太肤浅，要么太宽泛，与其目标相乖离。所以作者建议，各院系要评估下设专业的设置机构，确保专业课的要求合理适度，并恰当地服务于本科教育的目标。最后，作者还特别对本章进行了简要的小结，由此可见作者对本章的重视。

在第六章《培养品德》中，作者认为，因为美国的年轻人习惯于养成自己的道德观，而不是遵循已有的道德准则，所以大学应该为他们提供最有帮助的阅读资料 and 最能引发道德思考的机会。教师不用强迫学生认同“什么是善”，但应当竭尽所能地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道德判断。这包括“道德推理的教学”和“增强道德意志”两方面。在“道德推理的教学”方面，作者建议，学校应该开设“应用伦理学”之类的课程，并将“有关道德两难问题的讨论”和“蕴含其中的道德理论的传授”结合，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包括严谨地思考如何处理道德两难问题的能力、评价各方观点合理性的能力和判定正确行为的能力。在“增强道德意志”方面，作者强调，大学应该通过课堂以外的途径，培养学生关心他人需要的意识，把正确的道德观念付诸实际行动。可以有几种方法，如教会学生换位思考，保证自己的行为不引起身边重要人物的反对，避免与自己的行为准则相冲突；在学校方面，大学里的权威人士应当以身作则，适时对引起争议的行为做出解释，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公正处理学生事务，包括各个相关部门每件小事的处理，特别是防止学生考试作弊，关注所在社区的发展，为学

生提供到社区服务的机会。作者在本章的最后，还强调了每个大学都要认真思考“道德培养”这一重要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强调，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的同时，不能让教师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观点强加给学生。

在第七章《培养合格公民》中，作者首先指出，美国政府的历届领导人都反复强调：“教育是民主健康发展的关键。”教育要培养公民有效参与公共生活的责任感和能力。接下来，作者从“公民责任感缺失带来的挑战”、“大学的回应”和“更具体的公民教育计划”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在“公民责任感缺失带来的挑战”方面，作者分析了美国年轻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尤为消极的状况和责任感缺失的后果，而中小学教育公民课程地位的下滑，还不足以培养称职的公民，因此大学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大学的回应”方面，作者指出，大学对公民教育表现冷漠，其表现是失败的，没有帮助学生更高效地参与到政府和社区活动。随着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泛滥，本科教育逐渐丧失了其公益性，多数学生将大学教育视为谋求高薪的晋身之阶，很少将其作为推进政府和社区发展的手段。在“更具体的公民教育计划”方面，作者提出，大学首先要明确公民教育的目标：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掌握在理性选择中必须具备的知识；进而明确其核心知识，包括民主概况、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具体课程由学校自己决定。同时，学校要采取多种方式扩大和改进社区服务项目，鼓励学生组织的发展，运用民主程序培养学生积极的公民责任感，通过组织辩论赛、与候选人见面、模拟集会等活动，增进学生对有关政治活动的了解。最后，作者强调，大学要竭尽全力，为改善现状有所作为。

在第八章《生活在多元化的校园》中，作者指出，随着近年来女性和少数族裔地位的上升，如何创建一个多元化的校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大学校园里，各种群体和关系错综复杂，作者选取了两种代表性的关系予以讨论：一是黑人和白人的关系，二是男女生关系。在“黑人和白人的关系”方面，作者指出，尽管众多研究表明，在促进种族宽容和种族理解方面大学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有很多校园还面临紧张的种族问题，因此大学在这方面仍任重道远。所以，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多元化的校园是大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要给学生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机会与其他群体的同伴分享他们的传统和文化，如跨种族跨文化论坛、多种族合居宿舍、成立“第三世界中心”。在“男女生关系”方面，作者指出，男女生之间交往的增加和关系的日趋复杂，许多旧有的

规则随之消失，大学生们发现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行为：究竟怎样的行为是合适和可以接受的？谁应该率先提出约会的请求？学生应该拥有怎样的夜生活？大学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步，如男女混合宿舍的出现为男女学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绝大多数住校生对他们的居住环境和社交生活感到满意，但大学还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找到更好的方案解决一些棘手（像性侵犯之类）的问题。最后，作者提出了“促进人际关系的综合培养计划”问题，其中还包括培养学生与人合作、与人协商和说服他人的能力，提升学生仔细聆听的能力，培养学生理解他人情感和行为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是通过正式的课程还是课外活动？“人际关系课程”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还会引起争论，但作者相信，每所大学都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帮助学生会如何更好地与他人相处和共事。

在第九章《为全球化社会做准备》中，作者首先指出，尽管美国大学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但大学生对国际事务依然知之甚少。而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大学有责任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为全球化社会做准备。接下来，作者从“为全球教育提供机会”、“制订更好的方案”和“全球教育发展展望”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在“为全球教育提供机会”方面，作者认为，各大学为学生开设了大量的跨文化课程，开设了外语课程，为学生提供了海外学习或工作的机会。国际学生的加入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这帮助学生为今后全球化生活做准备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制订更好的方案”方面，作者提出了他的设想，针对上述四个做法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在“全球教育发展展望”方面，作者赞同一些专家的观点：为了促进全球理解学生需要掌握“跨文化能力”，但如何培养和如何评价具有相当的困难。尽管如此，作者相信，全球教育项目一定能取得长足的进展。

在第十章《培养广泛的兴趣》中，作者首先指出，自己在本章将重点讨论通识教育的核心目标，即大学如何通过通识教育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打破学科或专业领域的界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同时还指出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四种模式：经典名著课程、概论课程、探究课程和指定选修课程。接下来，作者对这四种模式分别进行了讨论。“指定选修课程”模式是最易操作且最易管理的课程模式，其优点是灵活多样，学生自由度大，但很多学生只选择简单课程。同时，课程目标定位不清是另一弊端。作者指出，指定选修课程要取得成功需要三大条件：一批尽心尽责、愿意花

时间为学生提供咨询的老师，一群天资聪明、学习动机强烈、有全面发展愿望的学生，一组精心设计、能唤起学生好奇心和学习热情的课程。否则，就会成为课程的大杂烩。“经典名著课程”模式在理论上具有很好的教育价值：能培养心灵自由、气质高雅、具有推理能力的人才；能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并加深对社会问题和道德两难问题的思考；激发学生对相关的人类精神或物质活动的兴趣。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增加了教师的负担，合格的师资欠缺，名教授不愿上这类课，操作层面有缺点。所以导致多数大学不选择该模式。“概论课程”模式乍看有吸引力，似乎能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问题在于：该类课程往往空洞无物，泛泛而谈；没有深入分析，浅尝辄止。“探究课程”模式的支持者认为探究课程将使终身受益，为他们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但能否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绝非易事，有人批评该课程模式过于重视方法的训练而忽视了其他品格的养成，同时在操作上也面临一些问题。还有一种“混合课程”模式，作者认为，可能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最好的课程模式而是看其是否唤起了教师的责任心，是否增强了各系间的凝聚力，是否增进了全校师生对本科教学的理解。最后，作者对“下一步做什么”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与其纠缠于如何实施通识教育，倒不如着眼于增强通识教育课程的师资力量。师资是成功推行通识教育的关键所在，如果有大批才华横溢的教师的加入，那么科学课程、历史课程或文学课程将成为学生大学生涯最难忘的课程之一。他进一步强调，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激发学生持久的兴趣是本科教育众多目标中最重要的两大目标，现有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各大学应一如既往，努力推动通识课程的发展。

在第十一章《为职业生涯做准备》中，作者首先指出，美国一部分崇尚自由教育的教授反对在大学实施职业教育，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职业教育只着眼于技能的训练而不是学生心智的发展，因而职业教育的合适场所应是就业单位或职业学校。作者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在大学实施职业教育，而是如何赋予职业课程以新的含义，使学生明白职业教育并非等同于技能训练。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职业教育和自由教育携手并进，激发两者的活力，更好地为学生服务。接下来，作者从“职业选择”、“职业性专业”、“文理专业”三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作者以“面临的重大挑战”为题谈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美国本科教育受两股力量的影响：一股来自大学教师的拉力——学者有学术自由的权利；另一股来

自市场的拉力——学生享有自由择校的权利。这两股力量相互抗衡，共同作用于大学的职业教育。如何正确对待学生的职业需求是高等教育遇到的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将一直困扰大学。只有当职业院系教师和文理学院教师携手共进，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潜能，才能取得好的成效。

在第十二章《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展望未来》中，作者首先指出，尽管一般人都认为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而且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大学教育确实有助于学生发展，但从研究看，学生在各方面的进步不是很大。在重点大学里有一半学生认为大学在帮助自己发展分析能力、写作能力以及专业知识方面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有些学生甚至在作能力、计算能力、外语能力等方面出现了退步。而且，尽管大学危机重重，但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者尖锐地指出，现实已不允许人们再自满了。接下来，作者从“为什么我们的大学表现不佳”、“持续的评价和实验有问题吗”、“改革的可能性”及“迈向新阶段”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在“为什么我们的大学表现不佳”方面，作者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大学在改善其本科教育质量上缺乏足够的压力，所以许多教师墨守成规，自我感觉良好，不重视发展学生基本技能的基础课程，不愿意探讨教学方法，不注重研究学生的学习过程，不关注学生的课外生活。大学领导者更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改善本科教育质量。在“持续的评价和实验有问题吗”方面，作者提出，教师可以通过一系列简单的问题对本科教育质量进行评估，如每堂课有多少时间用于积极讨论？考试是侧重于批判性思维的考查还是事实性知识的记忆？学生是否认为课程有助于提高分析问题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发展？学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数理推理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在“改革的可能性”方面，作者的态度看来是比较悲观的，他认为，大学教师不愿意他人来评价自己的工作，学生对教育改革的呼声不高，大学领导人也没有负起相应的责任；大学之外的力量也不大有效，如问责制、大学排行榜、全国学生参与度调查。在“迈向新阶段”中，作者阐述了自己对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看法。他认为，真正富有建设性的改革只能在于大学自身。政府应扮演监督者而非评价者的角色，鼓励大学进行自我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完善。政府机构和基金会对全面系统进行改革的学校给予资助，以进一步推动改革。校董会也可以推动本科教育的改革。但真正有效的工作只能由大学自身完成。在这里，大学校长的作用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大得多。校长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为大学的发展勾勒蓝

图：确定大学的教育理念，确定大学的优先事项，为大学的发展指明方向。作者明确指出，如果大学校长过于看重大学排行榜，并将提高本校在排行榜上的名次为己任的话，那将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相反，大学校长应该鼓励大学进行自我评估、教育实验和改革。只需略微增加财政投入，学校就可以在很多重要方面落实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政策。大学校长还可以改革教师聘任和晋升机制，使其与教学质量直接挂钩。作者相信，通过鼓励、鞭策和精心的调查研究，任何大学的领导都有希望创建一种“自我评估—不断实验—不断改进”的校园文化。他认为，现在正是大学领导者们为自己的学校和学生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时机。

## 二、启示

通过上述较为详细的介绍，相信读者也会和我一样，被博克校长对本科教育发自内心的重视和精到的思考所感动。感动之余，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在我看来，至少可以有如下几点启示。

(1) 要紧紧抓住大学的根本。《论语》第一篇第二章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做任何事情，都要务本，都要抓住根本，这是中国古代先哲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的真理，可是现在的我们却经常忘记了这一点。那么，办大学，其根本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本应十分清楚的答案现在却变得不十分清楚了。这种情况，只要看看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对什么最感兴趣就知道了。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学校的级别、学校的排名、学校得到的重点学科、大项目和经费等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有多种，如社会的急功近利、教育主管部门的指挥棒、媒体的舆论导向等，但我们大学校长本身的认识水平和博克相比，是否存在明显的差距呢？我们都知道，当今大学的功能越来越多，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有人还加上了国际交流。但无论如何，任何时候都必须将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可是实际上，中国的大学是将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放在前位的，因为它们能给大学带来比人才培养更大的、看得见的利益。进一步看，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是更加重视研究生教育的，甚至以研究生人数超过本科生为学校的发展目标，因为研究生能给学校带来科研经费和论文发表的直接好处。而且教师也更愿意从事研究生教学，因为轻松省事多了。我们也应知道，本科生的培养比研究生更重要，因为他们人数更多，又处于从高中到大学的人生关键转变期，需要更多的关心和指导。而

且，只有有了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的优秀生源才有保证。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大学以人才培养为本、人才培养以本科生培养为本的清楚答案就在当今的中国变得不清楚了。顺便说一点，本书的名字其实应该翻译为《回归大学之本》更为合适。因为全书论述和强调的都是大学要抓住本科教育和如何培养本科生这个根本问题。

(2) 要制订实在的培养目标和可行的培养措施。中国的大学，对本科生也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但多数显得较为大而空疏，如德智体全面发展、拔尖创新之类，加上又无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所以难以落到实处。从书中博克所提出的八个目标看，都是比较具体的，如处于前三位的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道德推理能力。即使是较为抽象的公民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素养、全球化素养，其包含的内容也很具体。从中可以看出，博克提出的目标是一个兼顾能力和素养、兼顾眼前和未来、兼顾自由教育和职业需要，比较符合美国实际的本科教育目标。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具体提法，但这种务实的批判精神和思维方法却是不能不借鉴的。而且，博克强调要将本科生的培养作为全校教职工共同的任务，所以，书中使用的提法是本科教育，而不是本科教学。反观中国的大学，通常的提法是本科教学，很少用到本科教育，似乎对本科生的培养只是本科任课教师的教学。同时，中国大学还经常强调“教书育人”，自以为是对教师工作重要性的强调。殊不知，这恰恰是对本科教育工作的简单化理解：以为对本科生的教育就只是教师的工作，而教师的工作就只是教书。虽然强调了育人，却是在简单化理解基础上的强调。从教育到教学再到教书，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内涵越来越窄，正是这种越来越窄的简单化理解，使得不少教师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教书，甚至成了教书匠，而培养学生的任务就成为仅仅是教师的任务，从而使得人才培养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应该认识到，育人是全校的使命，是每一个人都肩负的职责。要树立全校共同育人的理念：教学育人，科研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氛围育人。这五者中，既包含学术水准和文化品位，也包含管理水平，同时还体现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服务方向。正如博克在书中指出的：“一所大学的价值观能从各个部门（经济资助办公室、宿管科、学生事务办公室等）的每件小事中体现出来，而且，这些小事往往比学校高层宣传的政策更能传达学校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它们对学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sup>[1]</sup>在当今的中国大学，常常听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谁大的争论，以至“去行政化”的呼声愈来愈高。其实，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应该是，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其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无疑，行政权力不应无节制地膨胀独大，在大学这种学术组织中，行政权力必须为学术权力服务。但学术也不应该一己独尊，因为大学并不是研究院，只以学术为目的。应该时时记住，大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才。因此，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都必须为培养人才服务。

(3) 要大力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书中在多处强调教学方法改革的重要性，对现实中大多数教师普遍采用的填鸭式讲授法进行了批评，并且推荐了多种较好的教学方法，如问题讨论法、体验式学习、合作学习、服务学习、学习社区等。中国大学中的情况更是如此。要真正提高本科教育质量，除了大学领导者的重视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包括考试方法的改革和学生评价方法的改革。这是一项涉及成千上万教师、面广量大而又极为艰苦，但是又必须进行的改革。否则，我们的教学就始终停留在灌输知识的层面，而很难形成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国家主管部门、每个大学和每位教师，也包括广大学生，都要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不认真进行教和学的方法的改革，中国大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就永远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得到实现。

(4) 要重视教育研究，特别是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包括校本研究。博克校长在书中引用了数以百计的教育研究报告和他们的成果，而且在多处强调了教育研究的重要和教师借鉴教育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员很多，发表的研究论文也很多，但是产生的成效很有限。其原因一方面是研究的针对性、实证性不够，另一方面是广大教师对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视不够，不去主动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当然，归根结底，还在于学校对教师的要求和压力不够。所以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译者在《译者序》中说：本书“最大特点在两个方面：第一，突出了本科教育在当今高等教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明确提出了关于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框架；第二，全面、细致地运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分析了美国大学本科教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作为在哈佛大学担任了20年校长的博克教授，能写出

这样一本书，不能不让我们感到佩服，而这正是建立在重视教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值得指出的是，博克在其校长任期内，曾亲自主持了哈佛大学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四次课程体系改革（哈佛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课程体系改革于1872年由埃利奥校长推进，第二次改革于1909年由洛厄尔校长推进，第三次改革于1945年由科南特校长推进。看来，由校长亲自推进课程体系改革是哈佛大学的传统）。这次改革于1975年开始推进，经过7年到1982年才落实。其指导思想是：兼顾自由和秩序、多样化和专门化、灵活性和规范性、宽度和深度、个人兴趣和学校指导。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哈佛大学课程体系的标志性特色——“核心课程”，其由文学和艺术、历史研究、社会分析、科学、外国文化、道德推理、定量推理七个领域组成。这次课程体系改革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各国大学的课程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知在中国的大学，何时才能出现像博克这样真正称得上是教育家的大学校长和像《回归大学之道》这样由一流大学校长亲自撰写的本科教育专著？也许，只有到那时，中国的大学才能真正谈得上对大学之本的回归。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无独有偶，哈佛大学的另一位领导人、前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几乎在同时也写了一本书《失去灵魂的卓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侯定凯译），其副标题是“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将两书比照而读，一定会有更多的感受。与博克相比，刘易斯的风格有所不同，其批评更尖锐、更直接，针对的就是哈佛大学。但两人都具有共同的“居安思危”精神：在平安中看到危机，在危机中思考改革，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高素养的人。卓越固然可贵，值得追求，但如果没有了高素养的人，以至成为了失去灵魂的人，这样的卓越又有何意义？作为中国大学的每一个人，不是都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吗？

#### 参考文献：

[1] 德雷克·博克. 回归大学之道[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6.

[责任编辑：陈立民]